

脑文本的转化路径及其事件论意义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Brain Tex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Event Theory

潘伍豪 (Pan Wuhao) 张进 (Zhang Jin)

内容摘要: 文学创作、文学文本和文学接受是脑文本转化的不同阶段。创作是脑文本向书面文本的转化，也是作家将个体思想观念以物质媒介呈现出来并将其转化为公共观念的过程。接受是读者从书面文本中提取脑文本的过程，意义由公共领域重新流入个体思想。脑文本转化为书面文本再变为脑文本并非简单的、原封不动的意义传递，而是意义被增删、被修正、被重塑的事件化过程。作家对脑文本的转化受到无意识、语言规则等多种要素的影响，读者从作品中获取脑文本时也面临意义的争夺与博弈。脑文本的转化是一个不断被改写、不断被转译、变动不居的伦理事件。受到作者与读者的伦理选择的影响，脑文本在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中被选择、转化和重新生成。不仅脑文本中包含着伦理观念，脑文本的转化本身就是具有伦理意味的事件。

关键词: 脑文本；伦理事件；创作；接受；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潘伍豪，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张进，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学和文学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项目批号：17ZDA272】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Brain Tex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Event Theory

Abstract: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text and literary reception are different stages of brain text transformation. Crea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 into written text, and it is also the process by which writers present their individual ideas in a material medium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public concepts. Recep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readers extract the brain text from the written text, and the meanings from the public sphere flow back into the individual ide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 into written text and then into brain text is not a unchanged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but an eventful process in which meaning is added, deleted, revised and reshaped. Writers'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 is affected by unconsciousness,

language rules and other elements, and readers also face the competition and game of meaning when they get brain text from literary wo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 is a fluctuating ethical event that is constantly 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ethical choices of writers and readers, brain text is selected, transformed and re-generated in writers' creation and readers' reception. Not only do brain texts contain ethical concepts,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ain texts is an event with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itself.

Keywords: brain text; ethical event; creation; reception; ethical choice

Authors: **Pan Wuhao**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ture Theor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2647935125@qq.com). **Zhang Ji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hangj@lzu.edu.cn).

文学创作和接受是将脑文本转化为书面文本和将书面文本重新转化为脑文本的过程¹，从脑文本转化角度可以将创作、文本和接受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创作是作者将脑文本转化为书面符号存储在纸张上或其他载体上的过程，是作家将仅为自我所知的个体观念转化为可为他人阅读的公共观念的物质化与现实化过程。接受则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形成脑文本并把脑文本保存在自己的大脑中”（聂珍钊 王永 174），意义与认识又从公共转向私人。文学意义的生产经历了从脑文本到书面文本再到脑文本的变化过程，意义从个体观念流向公共空间再流入个体观念。“脑文本理论揭示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机制”（聂珍钊 王永 174），创作即作者生成并传递脑文本，接受即读者获取并生成脑文本，在脑文本的生产与接受中，文学实现了自己的教诲功能，作者与读者也对脑文本做出伦理选择并获得伦理教育。

但脑文本的转化并非无损传播，而是一场意义生产与再生产的伦理事件。脑文本在转化过程中会产生数量的变化和方向的转移，这种变化“出自伦理选择的需求”（吴笛 119）。数量的变化意指脑文本的增删，作者将脑文本转化为书面文本时受到外部伦理环境的影响，受出版审查制度和社会伦理法则的规约，出于对可能招致的伦理后果的恐惧²，作家意欲传达的脑文本和实际传达出来的脑文本总是形成不等量的关系。方向的转移意指读者从文本中获得的伦理意义未必符合作者的本意，读者脑中原有的脑文本和其所处的伦理语境影响对文本的解读和从中获取的伦理教益，脑文本的意义效果在转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脑文本的转化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双向伦理选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7。

2 如福楼拜等作家因作品而陷入的伦理纠纷。

择的过程，“根据特定伦理环境和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杨革新，“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 422）。脑文本转化作为伦理事件破解了“天才论”的浪漫主义创作观和主观的印象式批评，将原本与社会现实隔离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放置在具体的伦理语境中，考察其在创作与阅读时出于个人兴趣、现实利益和外在压力做出的种种复杂的伦理选择，揭示了人是主动性和屈从性的双重存在。脑文本转化中的种种变化体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连通，反拨画地为牢、限定文学边界的审美无功利论，这既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创立者聂珍钊倡导的回返历史语境和伦理现场的求实精神，又表现了文学参与并改造现实的积极意义。

一、创作：脑文本的现实化与公共化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作家对脑文本进行编辑处理的过程”（张连桥 92），作者之于文本意义的决定作用历来是衡量文本解释合法性的最终标尺，作者有权利用创作手记、日记、个人经历和心境决定文本意义，这一观点预设了脑文本与书面文本意义的一致性，即文学作品是作家脑中思想观念的直接的、原原本本的显现，作家始终在场并牢牢控制着意义的边界和内涵。“‘作品’这一概念本身，顾名思义，即赋予了作家以优先权”（小林康夫 5），中西文论中有大量此类论述，所谓“心画心声”“文如其人”，均以脑文本和书面文本的一致性作为其隐含前提。虽然苏轼意识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笔下之竹”的差别，但他将这种“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的原因归之为“不学之过也”（张志平 332），即经过苦学依旧可以实现二者的同一。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则更进一步，他认为艺术就是直觉，无需通过物质媒介表现出来，将艺术与观念直接对应起来，即脑文本与书面文本别无二致，艺术创造是脑文本的直接现身。这些观点忽略了脑文本转化时物质媒介的中介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伦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干预作用，认为脑文本转化仅仅与表现技法是否纯熟有关，简化了脑文本生成的复杂性。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之后，人失去了能够自主控制的可靠的统一自我意识，持有特定意向和意图的“自我显得既渺小又索然无味”（弗洛伊德 178）。主体行为的真正意义并不取决于被意识控制的意向性，而受控于那些连自我也未意识到的被压制、被阉割、被转换的无意识欲望。因此，脑文本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被切断，作品“不是诗人大脑中单一的动机和单一的冲动的产物”（弗洛伊德 9），而是无意识欲望经过复杂的“转移、凝缩、改装、拼置和拼凑”（弗洛伊德 228）之后的产物，是意识与无意识斗争、妥协的折衷结果，“艺术就构成了阻挠愿望的实现和实现愿望的想象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弗洛伊德 172）。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悖论与共谋关系，作家有意识的意图和并未意识到的欲望之间的纠缠与绞合形成文本意义，脑文本与书面文本之间的单向关系变得混乱而

复杂，脑文本的转化机制也由此变得多样。主体意识的不可靠性动摇了脑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契合关系，作家非自觉地创作出意图之外的更多的东西。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内容来源于幼年经历和被文明规则阉割与禁止的东西，作品是意识和无意识斗争过程中欲望的曲折的显现¹，这指出了作家在内在自我和外在规范之间的调适和折衷，而文学则实现了自我欲望与伦理规范的巧妙结合，为欲望提供了合乎伦理的表达方式。

脑文本向书面文本的转化“指的是把抽象的脑文本转换成具体的由符号构成的文本”（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120），这一步需跨越语言文字和真实存在之间的鸿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包含能指（生理部分、发音和听音）与所指（心理部分、词语形象和概念）²，语言不指向现实事物而指向作为其拟象的概念。在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那里，“词与物被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模式关联起来”（潘伍豪94），这种词与物的直接对应关系被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打破，语言并不对应和唤起事物而是指向具有任意性的概念，“能指的层次与所指的层次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伊格尔顿 124）。同时，作为“书面的词”和“口说的词”，“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索绪尔 47）。因此，书面文本的形成要经历从真实事物到心理概念再到文字符号的多重转化，其生成过程是从文字指向概念、概念指向一个能指转而又指向其他能指的无尽循环，语言中的意义总是被延异的。词与物不能直接对应，语言只能依靠对物的模仿打造出与物类似但并不相同的拟象。“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的原因在于事物、情感和体验之复杂性难以为模拟性的语言符号完全涵容，作者的意图和观念必须转化为约定俗成的公共性语言，语言的公共性势必删减个体意图的私人性。当试图将真实深切的个体情感体验以作为公共表达方式的语言符号表现出来时，就省略了情感中不可转译和不可为公共符号表征的部分，留下的是苍白的语言拟象。

“作家在把脑文本转换成书面文本时，并非能够把脑文本完整地书写下来”（聂珍钊 王永 174），从脑文本到书面文本的转化过程并非原封不动地将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拓印在物质媒介上，“语言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文字是脑文本的书面形态”（聂珍钊，“作为语言定义的脑文本及索绪尔语言观”5），从脑文本到文学作品要经历从语言到文字、从意识到物质的多重转化。作家创作意图之下幽隐曲折地表露出的无意识欲望，情感、体验和认识转化为语言时的遗失和磨损，“伦理意义或伦理两难的终极意义最终因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52-53），这些因素让文本中包含的意图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或创作之初的

1 参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达·芬奇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25-226页。

2 参见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页。

脑文本呈现出一种悖谬的不对称关系。脑文本向书面文本转化产生的意义差异与变化应当被作为动态的事件加以理解与把握。作家生产并传递脑文本是一个既主动又被动的过程，他既要以自己的意愿和观念向受众传递他认为正确的脑文本，这一传递过程又受到无意识活动和语言规则的限制，还要遵循社会公共伦理秩序，导致作者意欲传达的和实际传达的产生错位。这是一种伦理错位，作家需要对个体意愿与公共规则进行居间调停，以适当的伦理选择达到二者的平衡，在公共秩序的许可范围内表达具有自身独特性的脑文本。

二、接受：意义的争夺与博弈

阅读将书面文本重新转化为脑文本并非“由读者所接受或拒绝”（聂珍钊 王永 174）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意义争夺的伦理事件，是读者对寄寓在作品中的脑文本进行选择、转化、整合的重组过程。书面文本转化为脑文本也并不意味在已有脑文本中加入新的增量，新的脑文本的获得并不必然导致脑文本数量的增加，新的包含着不同伦理观念的脑文本的进入会动摇、摧毁和清理原有的脑文本中的伦理观念，新的脑文本的获得是“既有脑文本遭受外来脑文本入侵”（任洁 57）的结果，是一种复杂的、程度不同的兼并过程。“所谓阅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邂逅的运动”（小森阳一 3），最后产生的脑文本既不是文本中要传达的、也不是读者接受之前本有的脑文本，而是一种折衷的、混合的、双向改造的全新产物，它是文本意义的部分现实化和作为期待视域的读者原有伦理观念部分改变的混合产物，是“作品对读者的同化”（贝林特 159）和读者对作品的重置的双向运动。文学接受一词简化了脑文本获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斗争性，预设了作为现成之物的文本意义和全盘接受的读者，忽略了读者亲身经历文本预设的伦理事件时的斗争、挣扎、改变和重塑，低估了获取脑文本的艰难程度。

创作者会通过脑文本向读者传达他认为正确的伦理取向与伦理偏好，但这种传递方式不一定明白显豁，而是隐含在叙事技法或文本结构的布局特征和空间分布中，对读者的接受进行定向指引。许多理论家常以迷宫为喻说明文本内部的空间构型，阅读作品获取脑文本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的坦途，而是一块峰回路转的陌生之地，在作者借助叙述策略和修辞手法创构的伦理语境中历险，经历作者巧心设计或者无意而为的事件，产生真切的情感体验，并于情感体验中体悟与升华出具有伦理意义的脑文本。这一过程是作者干涉、引导和控制读者的过程，作者通过叙事的自然、逼真和“戏剧化的生动”为读者创造出“幻觉的强烈”（布斯 34），即“读者应该感到他已经‘真的在那儿了’”（布斯 44），通过对生活的精确复写制造出文本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家精心编排的人造物的幻象，为读者提供了通向现实的另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走向和归宿是作者预先规划好的。“我们阅读小说时的全部体验是基于一种与小说家心照不宣的契约”（布斯 46），作者通过巧

妙的视角选择和距离设定将他本人的观点和伦理倾向变为文本中看似中立的“客观对应物”，通过有意为之的标记、线索和指示帮助读者以作者预想的方式进行阅读，以此“控制我们的情感反应”（布斯 91）并传达相应的伦理意蕴。

因此，阅读意味着“我们试图在迷宫中找到一条出路”（布斯 34），读者看似自由实际却被作者牵引着在设计好的路线上行进。作者通过“一种透明的、能伪装出客观化效果的文体，使得人们意识不到具体讲述者的存在”（小森阳一 5），通过消弭文本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距离制造出文本等于真实的幻觉，不知不觉地作用于进入文本的读者，使读者接受作者的引导、控制乃至改造，于此，作者“创造了他的读者”（贝林特 126）。作者希望读者跟从文本的指引，“作为读者，必须放弃自我，屈从于它”（贝林特 159）。但完全跟随作者有丧失自我主体的风险，爱玛的悲剧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巨大影响即是例证。这里还存在作家伦理意图和作品伦理效力之间的张力。由于文学作品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时代的特性，而其中承载与传递的伦理意蕴和伦理指示却是属于某一特定历史的。作家创作之初或许只是为同时代人提供伦理示范，但超越时代的作品同样会对后来处于不同伦理语境、持有不同伦理观念的人产生影响，尤其在其伦理观念的架构尚未稳固之时，接触异质伦理观念会引起其伦理认识的混乱和伦理定位的失序，导致其分不清在现实生活语境中应当遵循的伦理和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与其认知和心理较为契合的伦理，有可能造成其与现实伦理语境之间的错位和冲突，从而造成并非出自作者本意的负面伦理影响。所谓“《水浒》诲盗，《西厢》诲淫”指的就是这种并非作者本意的强大伦理影响。

阅读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征服、服从、反抗、颠覆的矛盾斗争。德塞托认为将接受视为“被强加给他们的文本烙上烙印”（260）的看法忽略了接受活动的创造性，接受不是“复制语言操作者所创立的模型”（德塞托 262），读者在阅读中“创造了除文本本文意图之外的东西”（德塞托 263）。接受者而非文本才是这场阅读游戏的主体，他拒绝文本的询唤，以不合法的方式僭越文本的官方阐释者“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的边境线”（德塞托 265），冲击合法阅读方式与非法阅读方式之间的界限，这种阅读揭示出“阅读实践的真相”（德塞托 265），使人们发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出现了体制原来所隐藏的这两者之间的相互性”（德塞托 265），这种阅读具有政治实践的意味，它暴露了阅读方式和文本意义间的同构关系，指出某种意义是被某种阅读方式制造与生产出来的，因而并不存在一种天然合法的阅读方式和文本内在的、固有的本质意义，文本成为一块读者可以驰骋其上的意义公地，“文本的地理形态越来越少地组织读者的活动。阅读从决定它的土壤中解脱了出来”（德塞托 270）。

创造性阅读赋予接受活动以优先性，读者非但不顺从地接受文本中的伦

理教诲,反而以质询的眼光考察作者的伦理立场和伦理取位,文本由此成为众声喧哗的不同接受实践的斗争场域。上层意识形态的“涓滴”和下层接受者的盗猎与颠覆都通过文本来进行,前者“致力于使读者与某一精英(或半精英)阶层所散布的‘信息’相适应”,后者则“通过使自身的创造性深入文化正统性的缝隙而对前者施加诡计”(德塞托 266)。接受由此被转化为一种策略性的运用,文本的意思是什么让位于文本意味着什么。“盗猎”的读者既不被动接受作者创设的文本伦理语境,也不屈从于其所在的现实伦理语境,而是跳出二者之外,积极调用跨学科知识以突破文本预设的和当时社会语境中普遍存在的阅读惯习(habitus),对文本进行“非法的”、颠覆式的创造性阅读乃至“误读”。与奉行沉浸式阅读的读者将自己代入文本情境中的阅读方式不同,创造性阅读的读者将文本中的伦理法则拉入现实语境中进行检验,这意味着读者站在一种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去“运用文本”,阅读文本的目的由“文本说了什么”转向“我能从文本中学到什么”,以自我在实际生活中的需要为准则对文本中的伦理教诲进行有选择地取用,作者埋藏在文本中的伦理取位让位于怀抱特定目的的读者的伦理取位。

三、伦理选择与脑文本转化的事件论意义

就创作而言,“隐含的读者”作为潜藏着的文本结构引导着作家的创作活动,作者将自己的脑文本及伦理选择含蓄地埋藏在文本结构中以指示和引导读者,期望现实的读者能够像理想读者那样充分理解并认同他。就阅读而言,意义的生成总是无定的、漂浮的、随物赋形的,总是在转换过程中才得以现实化。阅读是一种对文本中语言多语义潜力的固定,是填补文本的空白点并消除其不确定性的过程,“我们阐释文本时的阅读习惯本质上具有社会性”(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 55),读者运用从社会伦理语境中获得的观念和方法来理解与阐释作品。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集体无意识、语言范式和物质媒介等多重力量的影响,文学文本是多重力量协商、互动、共同作用的混合产物,而成形的文学文本则否定了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试图以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遮蔽文本中隐含着的其他要素。当把固态文本转化为动态的伦理事件时,文本构成的复杂性才得以暴露。

脑文本转换过程中意义的增益与删减揭示出其作为伦理事件的复杂性。事件论关注的是脑文本到书面文本再到脑文本这一双重转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揭示意义转换的不连贯性,打破了文本从属于作者意图而读者从属于文本意义这一理论误认。文学伦理学批评则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脑文本转化过程中存在多重伦理语境的转化,包含作家所处的现实伦理语境、作家创构的作品伦理语境和读者所处的伦理语境与读者有意拨用的理论性的伦理语境,多重伦理语境的交叠使得文本具有复数内涵,作家在创作之前持有的脑

文本和凝定在作品中的脑文本与读者从作品中获取的脑文本和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的新的脑文本形成多元互动关系。对脑文本的转化机制进行研究就是分析、考察脑文本变化与伦理选择的间性关系，而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对脑文本的不同处理方式又受制于作者与读者所处的伦理环境。“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伦理和道德的独特表达”（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89），通过作者的伦理选择将其所处环境中的伦理规范凝缩于文本中并传之后世，使之发挥传播伦理教诲的功能。“文学的作用是通过赞颂美德和抨击邪恶来教授道德价值”（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92），文学的伦理效力并不直接体现在鲜明直白的情感表露中，而是表现在作家和读者对包含特定伦理价值的脑文本的重新组合与转化中。

脑文本的转化是一个既主动又被动、既包含主体意愿又包含各种不可控因素的伦理事件，推动脑文本转化的动力是充斥其中的不同的伦理选择。就创作而言，作家创作既要符合自身的伦理意愿，又不得不服从或受制于外界伦理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并不一定是人，有可能是意识形态、出版制度、收入考量等等），他所传递的伦理观念也会产生未必如其所愿的伦理影响，即伦理效应溢出或大于伦理意图。就接受而言，读者有一个从天真阅读（Innocent Reading）向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发展过程，前者是无功利的文学鉴赏，后者则服务于具体实际的目的，读者的主体性越强，伦理取位越明确，文本的意义就越容易受读者而非作者控制。脑文本转化过程中意义会发生流失与增殖，这些变化使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可视化了，通过对作家原初脑文本（呈现在手记、日记和信札中）和寄寓在成形作品中的脑文本的比对可以获知伦理环境的包容度与禁忌所在，通过对同一作品伦理影响（体现在读者评价和文学史定位中）的变化的考察可获知伦理语境的历史变化。这并不意味作品单向受制于外部伦理环境，它通过收集社会能量（格林布拉特语）来表达和释放社会中的某些伦理意愿和情绪，即作品将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意念和情感集中表现出来，人们又通过阅读作品获得情感认同与伦理净化，流转于人们心中的意念和情感在文本中得到安全的释放和纾解，文本使现实中的伦理压抑和伦理冲动得以分流和转化而不至于产生破坏性的现实影响。同时，文学的伦理影响会松动不合理的伦理规范，打破落后的伦理禁忌，文学中包含的伦理力量会逐渐渗入现实并改造现实，脑文本的转换就是这一文学与现实互动并互相塑造的具体表现。

Works Cited

阿诺德·贝林特：《艺术与介入》，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Berleant, Arnold. *Art and Engagement*, translated by Li Yuany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Booth, Wayne.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Hua Ming, Hu Xiaosu and Zhou Xian.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7.]

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Eagleton, Terry.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and Reception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Wang Fengzhen.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达·芬奇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Freud, Sigmund. *Leonardo Da Vinci and Daydreams: Freud on Beauty*, translated by Zhang Huanmin and Chen Weiq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0.]

小森阳一：《作为事件的阅读》，王奕红、贺晓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Komori, Yoichi. *Reading as an Event*, translated by Wang Yihong and He Xiaoxing. Nanjing: Nanjing UP, 2015.]

聂珍钊：“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1。

[Nie Zhenzhao.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ng.”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9): 115-121.]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作为语言定义的脑文本及索绪尔语言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2019）：5-18。

[——. “Redefining Language as Brain Text and based on Saussure’s Views.”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4 (2019): 5-18.]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06.]

聂珍钊、王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外国文学》

4 (2019): 166-175。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9): 166-175.]

潘伍豪：“本体与功能：论文学事件”，《天府新论》3（2023）：85-96。

[Pan Wuhao. "Ontology and Function: on Literary Event." *Tianfu New Idea* 3 (2023): 85-96.]

任洁：“《寻羊冒险记》中的‘羊’与隐喻脑文本的建构机制”，《外国文学》3（2023）：50-58。

[Ren Jie. "'Sheep' in Haruki Murakami's *A Wild Sheep Chase* and the Constructing Mechanism of Metaphoric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3): 50-5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Gao Mingk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吴笛：“《亡灵书》的生成启示与脑文本的呈现轨迹”，《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3）：111-121。

[Wu Di. "The Revelation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Book of the Dead* and the Traces of Brain Text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23): 111-121.]

杨革新：“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逻辑”，《文学跨学科研究》3（2022）：416-425。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22): 416-425.]

——：“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9）：50-57。

[—,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9): 50-57.]

张连桥：“文学伦理学批评：脑文本的定义、形态与价值——聂珍钊访谈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9）：85-93。

[Zhang Lianqi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Definition, Form and Value of Brain Text—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 (2019): 85-93.]

张志平编：《唐宋八大家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21年。

[Zhang Zhiping ed. *Collected Literary Prose of Eight Great Write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21.]